

《烬余录》：一本写给康熙皇帝看的书

烬余录

注

【清】张烺 撰 胡传淮 注

“湖广填四川”的成果不应该当成颂歌唱，“湖广填四川”的成果只是先民尸骸上的花朵，如果没有明末清初那场大浩劫，今天的四川会更好。当我们赞美“湖广填四川”的成就时，应更多地反思产生那场大浩劫和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历史教训，这才是一种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。《烬余录》就为我们进行深刻反思提供了一部生动教材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烬余录注

[清]张琅 撰 胡传淮 注

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
四川省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烬余录注 / 张焘 撰 胡传淮 注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0.11

ISBN 978-7-5034-2644-5

I. 烬… II. ①张… ②胡… III. 研究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TS972.1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865948 号

责任编辑: 袁 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印刷装订: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: 6100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6 字数: 125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《蓬溪文献丛书》总序

温勉双

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。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、长久性、基础性。物质有可能昙花一现,而文化将永久不灭。几千年来,中华民族历经无数磨难而不溃散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这条血脉作纽带,代代相传。

蓬溪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,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优秀历史文化。世世代代的蓬溪人,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。

蓬溪重教兴学,人才辈出。从宋至清,蓬溪有四十余人考中进士,故有“梓东邹鲁,文献名邦”之誉。他们中“或以才略冠时,或以文章见志”。明代席书,学术纯正,才识优长,乃嘉靖时名相。清代张鹏翮,位极人臣,扬历中外,为杰出的治河专家,时称贤相,是清代四川官位最显赫、名声最响亮的人物;其玄孙张问陶,号船山,不仅是清代蜀中诗冠,亦是乾嘉诗坛泰斗、书画名家。张氏一门,风雅相继,著书满家,极一时之盛,为清代蜀中第一大望族,后人赞曰:“风雅之集,荟于一家,海内所罕有也。”清代张氏家族与宋代眉山苏氏家族、明代新都杨氏家族,构成了巴蜀地区历史上最有名的三大家族。由此可见:蓬

溪具有深厚的人文资源积淀,形成了极大的比较优势,即使把这些放到全省、全国的背景上看,也是毫不逊色的,极具开发前景,特别是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更具有现实意义。

地方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,是内容上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,是一个地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和社会事业发展及风俗、民情、自然资源、人文景观等的综合反映。它包括家谱、方志、作家别集、诗文总集、文史资料、地方人士著作等等,是该地区发展轨迹的客观缩影与文化底蕴的智慧结晶。

一本详实的地方文献,是后人竖起的一枝地方精神标杆;一部完整的地方文献,就是一部地方精神文明发展史,正是这些地方文献,以一地汇之,则成就一地之文化的辉煌,并成为文化再创造可借鉴的资源;以一国汇之,则见证民族文化之演进,成为华夏文明的巨大财富。挖掘与利用地方文献,编辑出版《蓬溪文献丛书》的意义和重要价值,正在于此。2009年5月,我县成立了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。该中心主要从事以家谱、方志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的搜集、整理、宣传、研究,开发利用蓬溪家族文化,编辑出版《蓬溪文献丛书》。

《蓬溪文献丛书》的编辑出版,是蓬溪地方文献挖掘与利用的一大成果,是对蓬溪地方历史文化的一次全方位的系统梳理,让人们看到了蓬溪历史文化家底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在《蓬溪县志》之外,便有了一座鲜活生动、足以让寻常百姓涉足感受的蓬溪地域文化殿堂。从保存文献的角度看,又仿佛是一部蓬溪地方的《四库全书》,其功甚伟!

编辑出版《蓬溪文献丛书》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。我希望

大家,特别是有关方家和广大读者,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,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,推动我们把此项工作做得更好。我相信并期待着蓬溪地方文献的循环利用之花,一定会盛开在蓬山溪水间。

2009年8月

(作者温勉双,四川省蓬溪县政协主席)

序言：被遗忘的蜀中先贤

——张烺和他的《烬余录》

郑光路

张烺生活的动乱时代背景

打开胡传淮先生精心校注的这本《烬余录注》，一个叫张烺的蜀中先贤鲜活地出现在读者面前。

张烺(1627—1715)，字仲寰，号松龄，四川遂宁县黑柏沟(今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)人。他有个儿子张鹏翮(1649—1725)，是清初名臣、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清代 268 年四川籍官员中地位最显赫、最有名的人物。

《烬余录》，意思是浩劫幸存者的记录。要读懂《烬余录》，必须对张烺生活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。

其实张烺也是一个清初名人：康熙九年(1670)封徵仕郎、内宏院庶吉士。康熙十四年(1675)封奉政大夫^②、刑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)，诰封中宪大夫，山东兖州知府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诰封中宪大夫、兵部督捕左理事官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7)诰封资政大夫、兵部尚书左都御史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诰封资政大夫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，总

督河道提督军务。康熙五十二年(1213)诰封光禄大夫、户部尚书加三级。

张烺以上的“诰封”，虽然多为荣誉性“虚衔”，但可谓尊荣之至。

他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二日，享年九十。御赐祭葬，并赐其后裔良田四百亩，免交粮税以资爵禄，又修张公祠于庆元山脚，碑文为康熙谕祭，世称“瑶亭碑”。碑文曰：“圣主仁皇帝谕祭文，诰封光禄大夫、户部尚书加三级张烺之灵，朝廷宏锡类之恩，典均存殁；人臣著靖共之节，荣被庭帷。尔张烺，乃现任吏部尚书加三级张鹏翮之父，尔子历任有年，勤劳素著，推原所自，宜赉彝章，特颁谕祭，以慰幽魂，尔如有知，尚克歆飨。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。”

张烺如此荣耀，但张烺这个名字如今却并不广为人知。

这本《烬余录》，实际上是张烺的自传。《烬余录》最有价值的部分，是作为乱世亲历者，描述了李自成、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事迹，及清朝顺治、康熙两朝政事。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，弥足珍贵。

明末天下大乱，四川究竟受何影响？正史《明史》等书记载有些地方语焉不详、含混不清。张烺因父亲张应礼曾亲自参与战事并战死，所以他记忆深刻、记述准确。

如书中记述崇祯十年(1637)，“陕贼过天星、李自成、混天王、蝎子块等贼，由七盘关入蜀，陷广元、昭化、剑阁等州县，官兵败贼于广元。贼乃分混、蝎二贼，趋潼川。十一月，陷射洪；进围遂宁……”崇祯十一年，“官军败贼于梓潼，李自成子身逃遁入楚，余党散走。”

以上不仅记述了陕西农民军袭扰川北各州县时，与明朝官

军混战的路线、地点,还记录了农民军头领外号如“过天星”等等,都很有史料价值。

张献忠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。近几十年来,传统定论对张献忠是一味“拔高歌颂”、“任意妆扮”。

我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和写作重点,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重大历史事件为主。我一直认为: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的源头应当理清,张献忠剿四川的真相应当辨明。歌颂张献忠暴虐杀人行为,实际上是在污辱四川先人和损害现今四川形象。这是有关四川历史、中国历史大的原则问题。

2005年,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课题,我开始写《“张献忠剿四川”真相》一书(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)。

张献忠进入四川建立大西国后,已彻底成为充满封建皇权思想、耽酒好色(有妃嫔三百名)的封建帝王。两年多时间,他不断在巴蜀大地“杀鸡取卵”一样地抢掠、剿杀,造成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重要地区人口锐减、土地荒芜,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。事实表明,大西国和历代封建王朝并无任何本质区别,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农民革命政权”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个“草头皇帝”不但“治国无方”,其奢侈腐化、专横残暴,比秦始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以张献忠进入四川建立大西国为转折点,连年战乱使四川人口从明万历年间一千万人左右,锐减至1661年清朝政府统计只有八万人左右。巴山蜀水许多地方成为千里无人的荒漠,虎狼成群、残存百姓相互“人吃人”。因人口灭绝、社会生产力崩溃,四川已基本上毁灭。

我们当然不能把清初四川大毁灭,全归罪于张献忠一人。但张献忠对四川大毁灭是否必须承担主要责任?张献忠究竟剿没四川?怎样剿?恶果是什么?张献忠究竟剿杀了多少四川

人？史书记载他大肆残杀四川人是真有其事还是污蔑？以上这些都是我书中重要内容。

我在书中还讲述了浩劫幸存者的种种离奇故事：有人屠刀下虎口余生，有人周游“地狱”而幸存，有人变成野人、飞人、白毛人和“鬼怪”……以及“湖广填四川”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移民运动的来龙去脉。

写《“张献忠剿四川”真相》之前，我曾以数年时间潜心阅读各种正史、野乘、稗史、文集、笔记、奏议、方志、揭帖、碑铭……张炘这个名字令我分外关注。

崇祯十七年（农历甲申）八月十五日（1644.9.15），是张献忠攻占成都后的第五天，他在这天匆匆登基当上“大西国”的草头皇帝。改元大顺，称成都为西京，诏民间皆称新帝张献忠为“老万岁”，不拘良贱之家，令皆立“西朝皇帝万岁”牌位于大门。

这年农历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杀进北京。四月初，明将吴三桂与关外满清结盟攻“李闯”。李自成四月二十二日在山海关惨败，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武英殿草草即帝位，称“大顺国”永昌元年。三十日他就仓皇逃离北京，占领北京前后仅四十二天。李自成一路西逃准备立足陕西、四川，他派都督马科夺取保宁、顺庆、遂宁等川北地区，将同大西国抢夺巴蜀。

张献忠在顺治二年（1645）初，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：同时征剿川东南明将曾英、川北李自成部下马科。正月十六日（1645.2.12），孙可望、张广才率两军三万人马齐发。张献忠到成都北城“大安门”阅军，手摸胡子哈哈大笑：“有此劲兵三千，就可当十万人马，何况三万！马科等李自成部下应当不战自降了！”（参见〔清〕李馥荣《滟濒囊》卷3）

张献忠恶战后虽然把李自成的大顺军赶入湖北，但自己也损兵折将；征剿明将曾英的孙可望更是大败。而大西国也就从

此处于北有清军、东有李自成部、川中有残明及地方土寇势力的多重包围之中。张献忠和李自成“本是同根生”却“相煎何太急”。这是张献忠一着军事上的“大臭棋”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迅速灭亡。

大西国军事较量接连失利，使张献忠建国图霸之心丧失，剿民之心愈切。史料记载张献忠曾苦笑说：“只有杀尽这些反民，他们才不搞啥子‘起义’！”（见清·李馥荣《滄源囊》卷3“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，剿民之心愈切……献贼笑曰‘是惟尽诛之，始不起义尔。’”）

张献忠视臣民如草芥，一味幻想靠“嗜杀”改善危局，反而加快了自己毁灭。这就是乙酉年（1645）后的四川局势：各州县百姓由最初的畏惧归顺，因暴政不得不造反求生；而张献忠因此愤恨川民、越加残暴嗜杀。“张献忠剿四川”于是成了恶性循环，越来越凶残。

《烬余录》一书最为珍贵的，就是对张献忠这段祸川血腥历史的记述。

大屠杀中从鬼门关逃出的张炘

有关张炘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其实是很少的。我曾问过不少文化界和研究四川历史的朋友：看过张炘的《烬余录》吗？得到的回答大多是“没有”和“此书难见”。这正是出版这本《烬余录注》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。

我大费精神，在清·刘景伯《蜀龟鉴》卷6中，看到下面记述张炘的一些史实：

甲申年（1644），张炘刚十七八岁时，张献忠攻陷成都。第二年（1645），因张献忠“贼兵四出”，张炘把全家移入遂宁县城，但把母亲留在黑柏沟村子里守家。县城内，有天忽报张献忠的大

西军“将入县境”，县官闭城而守。张烺担心母亲安危，“奔至城门、心血潮涌”，在“夜二更，缒城而下”，奔回乡村和母亲相拥而泣。张烺这一出城，可以说是逃出了鬼门关。

第二天，大西军攻破县城后开始大屠城，张烺留在城里的兄弟们都残杀。大西军退后，当地“摇黄”土匪又“日夜焚掠”。张烺“扶母入山，道遇唐公夫妇”。唐公夫妇也就是张烺的舅舅、舅妈，他们哭着把女儿托付给张烺说：如今兵荒马乱，你就是你媳妇了……儿啊，你不要推辞！

张烺说：等世道太平，再迎娶吧。张烺母亲哭着说：你兄弟被贼军杀害在县城里。我还没孙子，你们必须马上成婚！

这时“星月皎然”，油菜花已比人高。于是张烺和表妹到油菜地中跪拜天地，在刀兵乱世的田野中草草成婚，哪有什么酒席啊？这悲凉的“婚礼”结束时，张烺母亲才含悲“与唐夫妇破涕为笑”。天明后，刚成婚的小夫妻搀扶母亲四处逃窜。小夫妻俩很孝顺，“每得食，必母饱，然后食；母暖，然后（自己才）进衣。同行（逃难）者百数十人，或为虎狼食，（或）为土寇戕（害）”。（参见清·刘景伯《蜀龟鉴》卷6，引号内文字为书中原文，括号内字为便于理解而加）。

后来我终于千辛万苦才找到《烬余录》，又有幸读到胡传淮先生写的论文《民国本〈遂宁张氏族谱〉初探》（刊于《谱牒学论丛》第二辑，2007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），张烺事迹一目了然了。

在《烬余录》“乙酉顺治二年”（1645）条目下，我看到张烺本人记述张献忠剿四川时他的逃生经历：

“贼帅孙可望等率兵至重庆，为曾英所败，遂沿涪（江）而上，十月至遂宁。余时以事入城，因念老母在乡，闻贼警必多忧疑，欲归以慰悬望。诸兄坚留之，而余益心神恍惚，坐卧不安。因于是日潜出城，夜分始归家。母子相见，如同再世。次日，贼屠遂

宁城矣。时闻贼众已出城，至北关外旌忠庙，始传令回兵屠城。城中居人，无一存者。贼又掳其丁壮千余人，带至西洲坝，尽杀之。余诸兄及族姓之在城者，悉遭其厄！……余乃悉窖藏其米谷等物，奉母氏入深山中。自是野处露宿，岁以为常矣。”

张焘《烬余录》中，关于张献忠干儿子孙可望在遂宁“屠城”的细节描述，比上文《蜀龟鉴》中更为真实如画。

张焘的描述是真实的吗？我又找到另一个乱世幸存者王新命的记述：

就在“屠遂宁”的同时——“顺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”（1645.12.10），大西军骁骑都督刘进忠奉张献忠之命，也在离遂宁不远的潼川（即今三台县）屠城。王新命亲见家乡潼川遭屠城后“尸横城野……潼州城陷，火光烛天。顷刻之间，数万家无一存者。予家七十余口并一九龄之妹，（我）皆目睹遇害！”

而王新命极为偶然地死里逃生：十二岁的他被大西军掳至军营，途中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溜进县城文昌庙中。他见神像座下有个石板，搬开石板见下面有一个洞，就躲藏起来。后来大西军走了，他才捡了条小命……王新命这个名字，很可能就是他死里逃生时另取的。（参见民国《三台县志》卷14《武备志》引文）。

还有一个乱世幸存者傅迪吉，住家简州（简阳）五马桥，乱世平定后也写了篇自传《五马先生纪年》。傅迪吉记载顺治二年十一月时，大西军屠简州城时他亲见：“突然间号炮三响，随即传令各营杀人……登时只闻刀响，大杀逾时。与昨日不同，久之尸满大坝，无人可杀，住刀。随拖死人下河，河面不知堆积几层。及视墙下，所存（死尸）甚多，犹难计数……”（见傅迪吉《五马先生纪年》，载《圣教入川记》附录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第108页，1981版）。

张献忠执行的基本上是“三光政策”：杀光、烧光、抢光。当

时人顾山贞《蜀记》中记述：“剿洗(成都)已毕，复命各将军分头四出，烧房屋、粮草。”《流寇志》也记载：“城中人杀尽，令所部搜山，每屠一路，册报某日某部杀人数……”

张烺、王新命、傅迪吉等亲历者记述，令后人似亲眼目睹张献忠大屠杀时的种种惊险、惨烈的画面。亲历者们的记述，可与各种中外相关史籍相互印证，说明其真实可信，史料价值极高。这清楚证实了张献忠对四川的毁灭性滥杀。

然而，一些史学者却狂热地歌颂张献忠的疯狂屠杀：“地主阶级造出了拙劣而荒唐的谣言！”“张献忠农民军，革命声势磅礴，革命威力强猛……怀着满腔阶级仇，拿起刀矛，杀向地主阶级，横扫封建统治，这是正义的斗争，是可歌可颂的大好事。无论地主阶级怎样咒骂和诬蔑，也抹杀不了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。”（见胡昭曦《张献忠屠蜀考辨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第30、31页，1980年版）。

这些研究者因为现实生活中“阶级斗争”的需要，将张献忠定性为不容人置疑的“农民起义英雄”，将大西国定性为“农民革命政权”。他们完全不顾张献忠暴虐残杀对四川大破坏的真实历史，千方百计地为张献忠屠杀行为“辩诬”。他们对《烬余录》这类书，说成是“污蔑”、“反动”、“狂吠”、“走狗”、“造谣”……

这些，已完全没有起码的尊重历史的治学精神，其不良影响恶劣，如现在互联网上主张“以暴易暴”而歌颂张献忠暴虐杀人行为的言论很多，就常以某些“极左”著述为根据。

九死一生的浩劫幸存者

百姓杀光，皇帝梦泡汤，张献忠占据成都仅两年。顺治三年（1646）秋八月，张献忠彻底破坏成都后，率军开始向川北仓皇

大逃亡。他仍一路滥杀,被强迫随大西军北行的外国传教士利类思、安文思,留下亲眼所见的记录:“献忠率领大队人马,沿途奸淫烧杀,所过村庄场镇,尽成丘墟。”(见古洛东:《圣教入川记》,第40~41页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1)。

中国史籍中留下极类似的记载,相互印证了这方面史实的可信。如《蜀记》中说张献忠沿途杀残存百姓:“是时……由汉州、金堂、什邡、绵竹一带踏荒前进。间有一、二孑遗(指残存百姓)皆衣棕食草,隐避土穴之中;亦必寻踪步迹,找杀至尽方止!”

张炏的家乡川北各州县的残存百姓,再次遭受难以置信的茶毒。

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(1647.1.3),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、太阳溪侧的多宝寺前,被肃亲王豪格亲自率领的清军射手雅布兰射死了。1606年出生的张献忠,死时虚岁42岁。

张献忠死后,南明各杂牌军、各地土匪、清军之间混战,进一步大破坏。许多亲历者留下浩劫中的真实历史记录,如欧阳直在《蜀警录》中概括张献忠祸川后的四川严峻情形,说:“自乙酉以迄戊(子)、己(丑)(从1645至1648、1649年),计九府、一百二十州县,惟遵义、黎州、武隆等处免于屠戮,上(川)南一带稍存孑遗,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……间有逃出三五残(存)黎(民),初则采芹挖蕨,继则食野草、剥树皮,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!”

这就是当时四川百姓悲惨的生存状态。张炏在《烬余录》中记述:他这一族人在明末有一万多人,“劫运后,逃散死亡,靡有孑遗。独余从万死一生中,得延余生。”

清初连年战乱、灾荒、瘟疫、虎患……川民遭到始无前例的重创,只有极其少数的“幸运者”、“强者”,才能藏匿深山密林,躲过浩劫而死里逃生。九死一生的张炏就是其中之一。

张烺夫妻“奉母氏入深山中。自是野处露宿。”好不容易盼到顺治六年(1649)后,四川稍微太平了一点点,张烺妻子生下了张鹏翮……当张烺年近五十岁时,又遭遇吴三桂等人的“三藩之乱”。张烺二儿张鹏举当时年已十七岁,又背负张烺夫妇二人逃避深山过着“野人生活”……(参见清·刘景伯《蜀龟鉴》卷六,引号内文字为书中原文,括号内文字为便于理解而加)。

这里有必要简单归纳张烺所处的清初四川长期战乱的情况。

第一阶段:明末四川已战乱频仍,清顺治元年(1644)至顺治三年(1646),因张献忠的疯狂剿杀和各种战乱,大规模地摧毁了四川社会生产力。

第二阶段:清顺治四年(1647)至顺治十六年(1659),清军与打着南明旗号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等,及各路杂牌军队混战;还有“摇黄土寇”祸乱巴山蜀水。

第三阶段:顺治十七年(1660)至康熙三年(1664),清军消灭了大西军及“夔东十三家”李自成残部,清廷统一全四川。此后早期移民入川,生产力稍有恢复。

第四阶段:康熙十二年(1673),吴三桂等“三藩之乱”,又祸及四川近七年。康熙十九年(1680)正月后,始进入太平稳定时期。

张烺这年已53岁了,一家人才算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。张烺前半生基本上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时代中。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回忆录命为《烬余录》,读者至此已不难理解了。

《烬余录》的重要史学价值

在清·法式善的《陶庐杂录》卷一中,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史实:

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(1713.4.12),是康熙皇帝 60 寿诞,宫中大庆旬月。二十五日(1713.4.19),畅春园正门前张灯结彩、人头攒动。在众人的翘首仰盼中,笑嘻嘻的康熙令诰封的张烺等数人至御座前,亲赐御酒,共庆天下太平、君臣长寿。“中和韶乐”的鼓乐声悠扬……张烺成为康熙皇帝的座上宾。

几天后,康熙专门召见大臣张鹏翮,君臣间有一段十分重要的对话:

“上问尚书张鹏翮曰:‘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,杀戮甚惨,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。’张鹏翮奏:‘无有记其事者。’上曰:‘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,张献忠遂至四川。其间详细,未能悉知。尔父今年八十有七,以张献忠入川计,约已十七八岁,必有确然见闻之处。尔问明,缮折进呈!’”

康熙皇帝又提高声音对其他几个大臣说:

“明末去今,为时尚不甚远。……此等载入史书,甚有关系,必得其实方善。张献忠有养子三人,耳鼻皆被割去,朕曾见之。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监管领,以致败亡。尔等纂修明史,其万历、天启、崇祯年间之事,不可忽略!”

这则史料,说明长达四十年战乱使四川毁灭,造成历史“断代”。康熙懂得“以史为鉴”,非常重视明亡教训和古今少有的四川这段惨烈历史。

张烺在《烬余录》中记述:“四月,诏问流贼张献忠入川始末,命长子(指张鹏翮)具疏奏闻。”在奉康熙之命后,张烺写了《烬余录》。书中起于明天启七年(1627),止于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),记述他在明末清初 89 年间的亲历、亲见、亲闻,约一万余字,是最可信的“三亲”资料。

张烺在《烬余录》中,除了上文中所述浩劫人生外,在“戊子顺治五年”(1648)条目下还客观地分析了四川人口灭绝的各种原因: